

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

顾廷龙题



李万健



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

李万健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89号

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

李万健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市顺义牛富屯印刷厂排版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875印张 177千字

1993年6月北京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013-1071-8

K·168 定价：6.2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我国历史上众多的目录学家中遴选出业绩卓著者三十余人，写成传略。书中对这些著名目录学家的生平事迹，从事书目工作的实践及其目录学著作、思想、成就和贡献，作了详细分析阐述。所选介者，均为目录学史上具有特殊贡献的名家。在写作上，作者不是孤立地介绍某家，而是力求写出不同之家学术上的相互联系、相互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体现整个目录学史的脉络，有一定学术深度。本书对研究目录学史、图书馆事业史和中国文化史，以及图书情报工作、出版发行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对文史工作者和广大青少年开展学术研究，学习文化史知识，也很有帮助。

序

中国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反映了中华民族一贯重视文化积累的传统。历代学者广泛应用目录学于古籍校勘、整理，他们或注重考订经史，辨别伪书，选择善本，辑佚文献，或通过类分文献，撰写提要，辨章学术源流，反映学术兴衰。中国目录学遗产之丰富，著称于世。

汉代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继此之后，各代均编纂官修目录，直至清乾隆年间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及历代著作之评论，引起同时代及后世学者的注目与研究。东汉班固纂修《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正史艺文志之先例，此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朝人著作。连同清中叶以后持续进行的补撰正史艺文志，则成为我国从古代至清末文化典籍的文字记录。从中也可见历代文化学术发展之一斑。宋代刻书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私人藏书的兴盛，藏书家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的风气较之唐代更为普遍。宋代以及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目录的文献价值，向为学者所重视。其它如古籍版本目录、地方著作目录、佛经目录等，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后人查阅文化古籍的线索。联

系到古代目录学理论著作：宋代郑樵的《通志·校讎略》、清代章学诚的《校讎通义》，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录学根深叶茂，而且远从汉代目录学形成之初，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辛亥革命以后，乃至现代，目录学研究经久不衰，对我国传统目录学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目录学的社会作用更为显著了。在目录学发展过程中有一批学者，他们不只是文史专家，同时还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但他们对目录学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介绍他们的生平和成就，对于普及目录学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李万健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任书目文献出版社副编审、副总编辑。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藏书与目录学研究。他主编过《目录学论文选》，撰写过多篇目录学论文，尤其是他与郑伟章同志合著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万健同志又写出新著《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则是《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的姐妹篇。由此又从另一个方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新的贡献。我以为《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有三大特点：

一、收录全面，选择得当。作者视野广阔，对中国传统目录学有着较深的研究。本书从历代学者中收录三十余家，上起汉代，下迄现代，他们都是在历史上对目录学有显著贡献的名家。书中或者评介他们编写的著名书目，或者阐述他们撰写的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述。虽然以人为篇，但篇篇之间又着力于他们在目录学方面彼此的影响和渊源关系。因此，单篇观之，可见每位学者的生平、学术及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全书观之，则又可从中清晰看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脉络。本书对专业研究者有学术参考价值，对青年读者亦可启示读书治学的门径。

二、论述精要，资料翔实。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古籍资料，参考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论证充分，阐述精要。作者在介绍每位学者的学述与目录学成就时，总是注意联系学者生活的时代，联系他本人生活经历、学术与生平事迹，或重点记述他们丰富的藏书，或点明他们多方面的学术专长，尽可能反映他们各自的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再剖析他们在目录学上的业绩与贡献，评价中肯。因此全书显示了这些学者的目录学成就所具有的时代特点与民族文化色彩，阐明了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延续与发展。由此表明，中国目录学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只有从文化学术的角度进行目录学的研究，才能揭示出历代书目或目录学著述精深的内容。

三、论史结合，通俗简明。中国传统目录学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目前仍不为广大青年读者所了解。本书选介的学者，都是历史人物，即使是现代的几位学者，也都早已谢世。作者在介绍他们的目录学成就时，论述与历史结合，比较贴切。一篇篇个人传略，如同讲述一个个历史人物故事，深入浅出，文字流畅。作者以浅显的笔触，通俗而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每位目录学家的成就，寓知识性、学术性于趣味性、通俗性之中。全书近三十篇，作者还通过篇名的文字标示，突出每位目录学家的特点与贡献。早在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姚名达就曾指出：“目录学应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万健同志所著《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的出版，对普及目录学的知识，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万健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作为书稿的第一

个读者，阅后有上述一些感想，作为小序，刊载于此。

朱天俊

1992年12月于北大中关村

前 言

在我国，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目录学的研究和应用也有着足以引为自豪的传统。从两汉至今，目录学家代不乏人，数以千计。这些目录学家的学术研究和目录工作成果，不仅代表着不同时代目录学发展的历史及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体现着自古至今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

阐明历代重要目录学家的学术研究情况、目录工作情况及其成就，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首先，对目录学家及其著作的研究，从来都是目录学史和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录学史研究对于发展目录学的重要意义，目录学对于学术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已为学界共识。对目录学家的研究，是目录学史及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可以展视中国目录学发生发展概况，总结目录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为当今的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工作提供借鉴，发展目录学，以服务于科学文化和物质文明建设。其次，对目录学家学术活动及目录学成就的总结分析，可以从中了解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许多情况。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对目录学家的研究是学术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和方法。例如，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目录著作发展变化的分析研究，诸如类目设置、著录图籍变化的剖析，即可窥见不同历史时期各门学术的兴衰变化和发展情况，等等。其三，对重要目录学著作的分析介绍，可以向文化学术界推广这些书目工具，发挥其“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和查检图书、指导读书、用书的作用，直接为今天的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便利。其四，我国目录学家多为历史上文化及政界名人，成就往往是多方面的。而他们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一般人却少于了解，其所取得学术成就的原因，特别是目录学对他们读书治学的帮助，也少为人知。因此，对目录学家的研究，对于从目录学角度去全面评价、认识这些学界名宿，学习其治学为人的科学方法，对于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都会是有益的。

这些，也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本书从历代目录学家中，选择其成就卓著、在目录学史上具有代表性者三十余家，分篇写成传略。每家均述其生平、从事目录研究和目录工作的活动及成就，剖析其目录学著作、目录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在写作上，虽系以家成篇集而成书（原则上一家一篇，个别为二人或几人为一篇），但力求各家篇章之间能互相照应，展示学术上继承、发展的概略，通过对不同时代的代表之家的分析阐述，去表现整个目录学史发展的脉络。例如，就书目的分类来说，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分法为开端，但它又是怎样发展到了魏郑默、晋荀勖和李充的四分法并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法的？这些分类法变化的历史原因及四部法能赖以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再如，宋以前的目录学家多是以目录著作去体现其整理和著录图书的思想和方法，但自宋郑樵始，则出现了专门研究目录学理论的著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不同时代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又是如何继承、发展的？全书尽力让读者对目录学史上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有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得到一个中国目录学史的概观。另外，书中还力

图通过对不同时代目录学家学术思想，尤其是目录著作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其反映的我国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情况，为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点线索和帮助。例如，到了魏晋时期，史学为什么能从汉代书目的六艺略中的一小类一跃而上升为四部法中的一大部类？读者可以从书中关于魏晋史学学术地位的上升和史籍数量激增的分析中得到答案。又如，佛经目录为什么能成为最早的专科目录？佛经目录的开端、兴盛及其原因如何？人们可以从书中对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发展和佛教经典的传播情况的分析中得到启示。书中对历代书目所著录图书特点的分析，也可从一个侧面去展现各科学术的发展变化情况。等等。希望这些对学术研究能有所裨益。

在目录学家的选择上，本书首先考虑的是其学术成就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作用和影响，重点选介那些成就突出，贡献大、影响深远的名家。其次，也考虑到时代代表性和不同阶层人物的代表性问题，介绍了个别在目录学史上有过特别贡献或别具特点的人物，例如自学成材而在版本目录学方面贡献突出的孙殿起即是。应当说明的是，从目录著作着眼，本书所选目录学家多为私家书目作者，官目、史志书目作者不多。有些声名很大的官目或史志书目的作者，本书没有选介。这主要是考虑到这类目录著作多为众手所成而仅署某人之名，其目录学成就往往很难全归其一人，甚至于有的著作的主要尽力者不是署名者。例如，《隋书经籍志》署长孙无忌撰（实为魏征撰）、《崇文总目》署王尧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署纪昀撰，等等，就目录著作讲，可谓经典，但我们却不应把著作之功归于署名者一身。此外，关于这类目录著作的介绍也已较多。因此，本书对其书其人未作选介。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专家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恩师朱天俊先生于百忙中审读了全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为之序。顾廷龙先生特为题写书名。值此书稿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学识和写作水平所限，书中舛误在所难免，敬祈批评指正。

李万健

1993.1

目 次

序	(I)
前言	(V)
目录学的开创者刘向刘歆父子	(1)
班固和《汉书·艺文志》	(10)
郑默、荀勖和四部法的创始	(16)
综合性佛经目录的始祖道安	(21)
四部法的确立者李充	(25)
私撰目录的开端——王俭和《七志》	(27)
僧祐和现存最早的佛录《出三藏记集》	(33)
阮孝绪及其《七录》	(37)
从《群书四部录》到《古今书录》——毋煊的目录学生涯	(43)
著名目录学理论家郑樵	(50)
晁公武和现存最早的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	(63)
尤袤和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	(74)
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及其《直斋书录解题》	(81)
开类书收辑书目之例的王应麟和《玉海·艺文》	(90)
辑录体书目创始者马端临及其《文献通考·经籍考》	(99)
焦竑和《国史经籍志》	(106)
大藏书家和书目分编专家祁承煜	(113)

黄虞稷与《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	(122)
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和第一部 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	(131)
杰出的目录学家章学诚·····	(139)
孙星衍和《孙氏祠堂书目》的破旧创新贡献·····	(150)
能藏、会读、善校、勤刊的著名版本目录 学家黄丕烈·····	(157)
张之洞、缪荃孙、范希曾与《书目答问》·····	(168)
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研究及科学书目分类体系的 开创先导梁启超·····	(180)
为目录学勤奋一生的余嘉锡·····	(198)
自学成才的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	(206)
书目编撰、收藏和利用专家郑振铎·····	(215)
爱国目录学家姚名达·····	(227)
当代著名目录学家、书目编纂家王重民·····	(239)

目录学的开创者刘向刘歆父子

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过：“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他称誉《七略》作者刘向、刘歆父子是“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说他们编著出《七略》是“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

说《七略》是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是范老就史学而言的。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说：“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目录学发微》）刘氏父子之《七略》，实际上是我国学术史上的辉煌成就，当然首先是目录学史上的辉煌成就。因为，正是刘向、刘歆父子相继，奋斗了二十多年，创造了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和著录方法，校勘、整理了汉代以前的大批古籍，并编制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图书目录《七略》，才使这些古籍得以记录、流传。刘氏父子的工作，记录了汉以前学术发展的基本情况，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也创立了学术研究的工具学科——目录学。尽管在刘向、刘歆之先，也有过校书和目录工作，但就其规模、理论方法，以及成就和影响讲，都远堪与刘氏匹比。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目录学的创始者。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后改名向。沛（今江苏沛县）人。生于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卒于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其父

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武帝称之为“千里驹”，宣帝封之为阳城侯，有家产过百万，是个大地主。由于刘向出身汉宗室和贵族，十二岁上就做了辇郎，在皇帝身边接受训练和教育，因此，有着坚固的封建思想基础和扎实的儒学根底。他精通春秋穀梁之学，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学家。其著述颇富，有《九叹》辞赋三十三篇及《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二十多岁上，刘向做了谏大夫，和萧望之、周堪等人一起，展开了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的斗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多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希望抑宦戚而固皇权。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由于石显等人诬陷，刘向同宦官、外戚的斗争失败，被治罪而去职。在闲居的八年时间里，他刻苦读书，研究、总结其政治上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思想进一步深化，政治主张更加明确、坚固。

公元前32年，汉成帝即位，石显等小人伏诛，刘向重返仕途，做了中郎，兼管三辅都水。也即在此时，他更名为向。不久，又迁光禄大夫，掌“顾问”、“谏议”及“议论政事”之职，终中垒校尉。他为人正直，治学勤奋，“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曾“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上嘉其言，常嗟叹之”（《汉书·楚元王传》）。

鉴于图籍典藏不周，利用不便，且多有散佚，成帝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采取了重要措施：一面命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求遗书；一面命刘向组织人力整理国家藏书。从此，刘向开始了其目录学生涯。一直到死前的十九年里，他的全部心血都倾之于整理、校勘图书和编纂图书目录上了。

有汉一代，政府先后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收求图书的活动：第一次是在高祖刘邦时，他接收了秦丞相府、御史府等官署的藏书，还下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大力收求图书；第二次是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汉武帝下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收到了“书积如丘山”的效果；第三次是与刘向开始整理校订图书同时，成帝命陈农到全国各地收集图书。到刘向整理图书的时候，政府藏书已是“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了（《七略》之《汉书·如淳注》引）。这么多的典籍，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和编目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其工作产生巨大学术意义的最重要的保证。

刘向统领的校书编目工作，首先从建立组织机构开始。他聘请了两类人来参加这项工作：一类是具有整理图书和编制目录工作经验的人，如杜参、班斡、王龚，以及其少子刘歆等；另一类是各学科方面的专门人材，如任宏、尹咸、李柱国等。在刘向主持下，对校书工作做了分工：在当时划分的六大类图书中，刘向自己主持整理校定经传、诸子、诗赋三大类；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校定兵书；太史令尹咸负责校定数术类图书；侍医李柱国负责校定方技类图书。任、尹、李三人只负责校定后三类书的新本，新本定后，所有新本皆由刘向为之写一叙录，抄于每书之首，上奏皇帝。同时，由刘向主持编定图书目录。

具体的整书编目工作，首先是广校异本，勘定新本。刘向对有汉以来近二百年积累的秘府藏书，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为了得到更多书籍，为了勘定出质量高的新本，除利用内